

# 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蒋 晖

**摘要:** 在国内外学界已有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研究中,遗留了一些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包括如何定义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确定其作家谱系、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如何与非洲的思想资源相结合、今日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处于何种状况,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中,最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非洲化,以它为基础才可能找到书写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的方法。本文在初步梳理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的基础上,提出这个研究领域需要思考的三个基本命题:一、区分“左翼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的必要性;二、充分理解非洲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三、非洲主体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非洲化的重要内涵。

**关键词:** 非洲文学;马克思主义;发现日常;恩德贝勒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African Marxist literary history,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aises key issues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 These include how to define African Marxist literature and identify its writers; how African Marxist art integrates its own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African Marxist literature. The most crucial issue is the African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which forms the basis for writing its history. This article, while outlining the African Marxist literary movement, proposes three key points for this field: 1) the need to distinguish “left-wing literature” from “Marxist literature;” 2)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flexibility of African Marxism; and 3) the fusion of African subjectivity with Marxism as a core aspect of Africanizing Marxist literature.

**Key words:** African literature; Marxism; rediscovery of the ordinary; Ndebele

**作者简介:** 蒋晖,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非洲文学、非洲思想史。电子邮箱:2812640335@qq.com。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编号:19ZDA296)的阶段性成果。

## 一、对研究对象所做的三个历史判断

无论是作为革命理论抑或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都对非洲文学保持着强大的阐释力,这是历史条件使然:非洲虽然早已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却无法脱离对西方资本的依附,国家发展停滞不前,人民和政府的冲突时有发生,阶级矛盾与族群矛盾交织于一起。在这种后殖民状况下产生

的文学的批判性是与之俱来的,非洲文学天然就是一种左翼文学。事实也是如此,非洲存在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仅以尼日利亚为例,十几年前,著名女作家伊非奥玛·奥科耶(Ifeoma Okoye)出版了描写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小说《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其中讲述了一个因家贫而辍学、处于绝望中的女孩琪雅的生活。小说的标题寓意明了:在通常所指的“三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第四个世界,它就像人间地狱,为整个世界所遗忘。<sup>①</sup>略做历史的回顾,奥科耶的写作显然处于一个悠久的尼日利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1979年费斯图斯·伊亚伊(Festus Iyayi)的长篇小说《暴力》(*Violence*)<sup>②</sup>是经常被非洲马克思文艺家们提到的作品。这部作品描写了尼日利亚工人饱受贫穷、失学、失业的痛苦,男女主人公最后不得不靠卖血和出卖身体来维持生活。在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都不乏这类作家作品的存在,可惜的是,他们生活在民间,在国际上一直默默无闻,声名和影响力无法和享有国际声誉的尼日利亚作家如阿契贝(Chinua Achebe)、索因卡(Wole Soyinka)、阿迪契(Ngozi Adichie)、塞浦利安·埃克文西(Cyprian Ekwensi)等相提并论。非洲存在着两种文学:一种是“世人皆知”的非洲经典,它们在得到西方的肯定后进入了国际阅读市场,也是中国学者主要的研究对象;非洲还有第二种文学,它们藏于地表之下,是赤裸的岩浆和烈焰,但不为世人所知,也不被纳入西方建构的“世界文学”叙事。

非洲完全具备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马克思主义文学在非洲并不兴旺发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无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尝试进行初步探讨的学者都会惊异地发现,“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传统”几乎是一项空白的研究,非洲马克思主义理论专著屈指可数、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集寥寥无几,甚至非洲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都未得到系统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然可以用来阐释任何一部非洲文学作品,但不是任何一部非洲文学作品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学。非洲文学带有天然的左翼性质,但是其中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只是极少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非洲化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并未开出理想的果实;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过于欧洲中心主义、教条化,无法有效阐释“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因此与众多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失之交臂,或者视而不见。除此两种原因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客观原因。

本文尝试提出以“非洲主体意识”为判断标准来重新定义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不过,在做这项工作之前,本文认为有必要先对这个知识领域

① 参见 Ifeoma Okoye. *The Fourth World*. New York: Rising People's Press, 2013.

② 参见 Festus Iyayi. *Violence*. London: Longman, 1979.

的一般状况做出几个基本判断,这是构造一个生产性知识的起点。

第一个判断,我们需要在研究中警惕一个幻觉,那就是非洲文学好像有很强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揭露性,特别符合“左翼文学”的特点,这会误导研究者做出“泛马克思主义化”的判断,将非洲文学主流都归为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之一部分。从非洲文学的起源看,它确实可以说是天然的左翼文学,<sup>①</sup>因为它来自黑奴后裔和来到法国的法属殖民地留学生发起的民族主义文化运动,承载着重建现代黑人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烈诉求。<sup>②</sup>这种文学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新的历史主体形成的自我表述。但独立后,非洲文学一直没有得到非洲国家提供的必要体制保障,它的生存长期依靠西方文化资本、市场和读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非洲之外读者看的。1973年,在尼日利亚举办的著名的非洲出版业会议——“伊费会议”(Ife Conference)上,与会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发展非洲出版业的举措,非洲出版人踌躇满志。10年后,当再次召开非洲出版业的会议时,与会者“指出许多与伊费会议所识别的相同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建立强大、独立、本土的图书产业方面进展甚微。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70年代的乐观情绪在80年代被警惕甚至悲观所取代。10年的奋斗、失望和失败已经造成了损失”(Rathgeber 57)。<sup>③</sup>

如果非洲作家头脑中的“想象读者”是西方社会,那么他们笔下“左翼”色彩浓厚的作品不也正是西方读者希望看到的东西吗?加纳伟大的文学家阿尔玛(Ayi Kwei Amah)的《美好的人尚未诞生》(*The Beautiful Ones Are Not Yet Born*, 1968)、《碎片》(*Fragments*, 1970)、《两千季》(*Two Thousand Seasons*, 1973)等作品深得西方的喜爱,因为这些具有现代主义和世纪末颓废色彩的作品被认为恰当地体现了加纳独立后的社会状态。等他放弃了前期写作,转而批判伊斯兰和基督文明,欲图在埃及古文化中找到非洲文化的起源、在泛非主义精神下提出具体重建非洲的计划时,他在西方已经不再受欢迎,许多著作在西方购买不到。西方文化市场强加给非洲文学的“左翼化”力量非常强大:只有对抗政府、描写国家阴暗面的文学才算是真正的“非洲文学”。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左翼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西方控制非洲文学生产的一种工具。“左翼文学”批判社会的性质已经变了味。

① 参见拙文:“论非洲现代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2016): 20-26。

② 在法国1930年代出现的“黑人性运动”及其批评,一般被认为是非洲现代文学批评的开端,参见Belinda Elizabeth Jack. *Negritud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Negro-AfricanÆ" Literature in French*.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6。对“黑人性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1920年代出现的哈莱姆文艺复兴,它是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第一个重要时期。参见周春:《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③ 文中未标注译者的译文均为笔者自译。

2005年,肯尼亚作家宾雅万加·瓦伊纳伊纳(Binyavanga Wainaina)曾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如何描写非洲”(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里面罗列出西方对非洲的各种刻板印象并戏谑地告诫非洲作家,如果要描写非洲,就需要迎合这些偏见。他说:

永远不要在书的封面或内容中出现一个健康、正常的非洲人……

你的非洲角色可以包括赤身裸体的战士、忠诚的仆人、占卜者和先知,以及隐居生活的古代智者。或者是腐败的政治家、无能的多妻制旅行向导,以及你曾经睡过的妓女。(Wainaina 334-335)

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以“身份政治”取代民族认同、推行文化多元主义,并且使得后殖民研究成为非洲研究的主要范式。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成为左翼批判思想的标签,非洲左翼文学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种新的文学里,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荡然无存。南非出生的英国著名学者贝尼塔·帕里(Benita Parry)曾这样批评后殖民研究:

如果一个有求知欲的学生期望接触到关于殖民历史、殖民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制度、殖民抵抗以及后殖民政权的阶级联合、国际联盟和意识形态退却的讨论,他/她很快就会发现,这些研究主要并非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开展,而是在社会科学的专门领域进行。此外,这样的学生还会很快发现,流行的后殖民理论模式并非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反殖民主义思想的产物,因为后殖民批评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都表现出敌意。(Parry 77)

鉴于如上考虑,将非洲左翼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学做出区别似乎是必要的。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努力探索着一条带有非洲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道路,而非洲的左翼作家则更在意回应西方的“凝视”。

接下来的两个判断是关于非洲历史上的两个马克思主义阶段所留下的政治和文学遗产。这里先谈论对第一个阶段的判断,这个阶段史称“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非洲知识分子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创建了一套非洲化的社会主义体制。非洲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已在1960年代末失败,但它留下的政治遗产至今清晰可见。它的第一个遗产是形成了一个灵活和富有弹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行非洲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如集体主义、人的平等、共同富裕、施行部分公有制原则等,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但他

们拒绝接受无神论——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学者福尔森说:

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和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都宣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塞古·杜尔的《非洲与革命》<sup>①</sup>就有专门讨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他几乎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所有观点,尤其是在哲学方面。然而,他却拒绝接受无神论,并明确承认宗教在非洲社会中的地位。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个人不能既接受宗教,又接受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就意味着排除对灵魂的承认,进而排除对上帝存在的承认。因此,塞古·杜尔对上帝存在的承认,至少意味着对传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种修改。(Folson 93)

宗教文化在非洲社会具有深厚的根基,撒哈拉以北为伊斯兰国家,以南地区的民众主要是基督徒。在非洲,世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埃及学者塞尔玛·博特曼(Selma Botman)曾著《埃及共产主义的崛起,1939-1970》(*The Rise of Egyptian Communism, 1939-1970*)一书,她指出,埃及推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大多来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们在埃及这个伊斯兰国家感受到异化,这是他们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驱力。<sup>②</sup>上述情况说明,非洲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相反,唯物和唯心、肉体和精神、物质与心灵总是被维持在一个二元论的价值体系之内。这成为非洲思想史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我是谁”是黑人形成现代自我意识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提出之时,指涉的是黑人心灵的归属,而非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精神性归属问题的急迫性高于物质利益的实现,有血有肉的黑人认同优先于抽象的阶级认同,这变成非洲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方向。

非洲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遗产体现在,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主张,这导致他们接受唯物辩证法却否认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来说,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鲜有认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寻找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基本决定因素。换句话说,对于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经济优先于政治,而这种观点与非洲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截然相反。”(Folson 95)尼雷尔(J. K. U. Nyerere)将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延伸的家庭”:“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目的是延伸的家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

① 参见 Ahmed Sékou Touré. *L'Afriqu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64。

② 参见 Selma Botman. *The Rise of Egyptian Communism, 1939-1970*.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1。

将某个阶级的人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而将另一个阶级的人看成自己的敌人。他不和兄弟结盟而消灭非兄弟。相反,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兄弟,是他的大家庭的一分子。我相信人类兄弟和非洲团结。”(Nyerere 11-12)这是典型的非洲否定阶级论的体现。

总之,如果我们放弃线性历史观,不持科学社会主义必然高于非洲社会主义的预设,那么就会看到:非洲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的二元论、存在论、反历史唯物主义等主张对非洲文学和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判断是关于非洲第二次马克思主义运动所留下的政治和文学遗产。在1970至19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 and 批判理论)和东方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理论在非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非洲的知识精英和革命者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和指导国家建设,而不再像之前的非洲社会主义者那样尝试将马克思主义非洲化。此时,马克思主义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和批评也是这个时候在非洲达到了高峰。孕育这个积极变化的条件是,非洲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挫折,尼雷尔推行的乌贾马(Ujamaa)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的政策和葡语殖民地的反殖斗争吸引了众多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来到非洲,直接参与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的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要么具体分析非洲新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要么直接参与反抗斗争。正是这批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带到了非洲研究领域,第一次借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将独立后非洲的发展问题呈现出来。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杰克·古迪(Jack Goody)、约翰·索尔(John Saul)、巴兹尔·大卫森(Basil Davidson)、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科林·利斯(Colin Leys)等知名学者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他们思想活动的高峰。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都吸引了大量年轻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产生了著名的“达累斯萨拉姆辩论”派,他们包括批评尼雷尔“阿鲁沙运动”的思想家伊萨·希夫吉(Issa Shivji)、写出讨论帝国主义经济学多卷本著作的瓦达达·纳布德雷(Wadada Nabudere)和当今著名政治学者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等。当时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话题集中于:“一、新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性质是什么?二、在帝国主义现实下,社会主义建设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是什么?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什么?在外国资本主导下这种关系有何特殊性?四、殖民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如何与之斗争?”(El Nabolsy 246)

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布基纳法索、

新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等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建立起来,开始了非洲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产生了一批革命领导者和理论家,其中著名的有号称非洲切·格瓦拉的布基纳法索革命领导人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桑吉巴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巴布(Abdul Rahman Mohammed Babu)、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革命家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爱德华多·蒙德拉内(Eduardo Mondlane)曾这样描述自己政党的转变:

我现在确信解放阵线有了较过去更清晰的政治路线。过去我们团结一致的地方是对殖民统治的愤怒和摧毁旧的殖民体系、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的信念。但是什么样的新秩序呢?其组织是什么样的?无人知道。不,有些人知道,但只是模糊的概念,或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意识。然而过去的六年是我们思想发生质变的时期,我现在可以说,解放阵线与过去相比更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进步的政党。我们正越来越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为何如此?因为莫桑比克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敌人都不允许我们有别的选择。(转引自Saul 61)

革命需要动员和教育人民。1982年,一场“文化与反抗”的盛大革命文艺聚会在博茨瓦纳召开,随后20年的时间是南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发展的高峰,“反抗文学”“民族文学”“工人文学”“介入文学”、大众文艺运动等话题得到充分的讨论。这种势头如果保持下去,那么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将会出现一个持久的传统。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趋势在1990年之后戛然而止。这当然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结果,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支持,基本丧失了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研究的空間。尼日利亚学者亚当·梅耶(Adam Mayer)描述了在失去中国的经济援助后、尼日利亚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艰苦处境。<sup>①</sup>

我们以南非为例,简要描述一下这种变化的由来。1994年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党取得政权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反而在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出现了巨大的停顿。革命文艺的发展依赖基层的文艺机制,如地方图书馆、广播、杂志和文艺工作队、民间艺术团体等。1994年之后,南非政府强化了文化市场机制,削减对民间艺术机构的资助,造成革命文学传播和落地网络的中断。南非著名文学评论家莱昂·德·考克(Leon de Kock)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丢失的剧情”(losing the plot),用以指称南非文学现状。南非该向哪里去?国家发展方向

<sup>①</sup> 参见Adam Mayer. *Naija Marxisms: Revolutionary Thought in Nigeria*. London: Pluto Press, 2016.1-18。

丢失了，在现实中找不到，在文学中也找不到。<sup>①</sup>

我们借用德·考克“丢失的剧情”作为第三个判断的表达：社会主义不仅是南非也是非洲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多年里丢失了的剧情，然而其线索却在文学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沉睡的历史记忆，也可能是新的叙事的开始。今天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就发生在此刻的双重可能性中。

## 二、对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反思

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历史状况是什么？我们借助三位学者的观点，先来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格奥尔格·古格尔伯格(Georg M. Gugelberger)于1985年出版了他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一书，他声称这是第一部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集。在该书“前言”里，古格尔伯格写道：“这部文集首次汇集了大量关于非洲文学的激进论文，这在日益发展的非洲及第三世界文学批评领域中仍然是一个重大遗漏。”(Gugelberger v)在这部书收录的13篇论文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4年。这个时间并不能精准标记非洲马克思文艺批评起始的时刻，但它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那就是激进的、革命性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大致开始于1970年代。如果比较一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苏联和中国的发展情况，它在非洲的姗姗来迟有点不可思议，1985年距世纪末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五年时间。

事实上，非洲进步文艺的出现远远早于197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文艺对于泛非主义运动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0年代由美国非裔发动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几乎七成作家或者加入了共产党，或者与之保持密切关系。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非西方国家所显示的政治力量直接导致了非洲独立运动。之后亚非作家会议和其他的进步作家国际网络让非洲的革命文艺有了生长环境。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召开的同一年，《世界文学》在第九、十两期译介了亚非拉文艺作品，这些都表明非洲文艺已经属于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文学的一部分。非洲两位作家——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和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是《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一书中最为推崇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他们成熟的作品都已经在1960年代写出。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直到1974年，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有代表性作品问世？

古格尔伯格并未给出答案。35年之后，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尼

---

① 参见Leon de Kock. *Losing the Plot: Crime, Reality and Fic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n Writing*.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6。

尔·拉扎勒斯(Neil Lazarus)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谈到了非洲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保守性特征:

我们必须记录的第二点是文学研究中去殖民化姿态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相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存在显著的历史滞后性。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民族志、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历史,甚至发展研究中,到1960年代末(或最迟1970年代初),与激进实践相一致并受其影响的叛逆性学术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突破。(Lazarus 184)

拉扎勒斯此言看来十分在理,因为发表于1974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山之作“现代非洲文学的意识危机”(Th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A Survey)的作者奥纳格(Omafume Onoge)即于1970年在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sup>①</sup>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进入非洲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人物。是什么原因使得文学研究跟不上文学发展的速度呢?拉扎勒斯做了如下分析:

虽然一些非洲作家可能参与了(或者至少公开赞赏了)这些后来的运动[第三世界文艺运动],但很少有非洲文学批评家参与其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洲社会在去殖民化时期高等教育的阶级结构造成的;更具体地说,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也与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大学中建立起来的衍生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与方法有关,无论是在北部的拉巴特、西部的达喀尔、南部的开普敦还是东部的麦克雷雷大学。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大学中对非洲文学及其创作的主流研究方法,当然也强化了这种由殖民主义产生的保守主义,这些方法几乎毫无例外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并且坚决地去政治化。(Lazarus 183)

如果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非洲肇始于1970年代,且直到1980年代中叶才有一本文集出现,那么它后来的命运如何?2020年,亚历山大·法伊夫(Alexander Fyfe)在《非洲身份》(*African Identities*)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研究现状”的专刊,他给专刊起的名字显然在向其前驱《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致敬,因为在后者面世后数十年里,并无另一个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评的选本出现。在“导言”中,法伊夫描述了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在20世纪90年代衰落的状况,他指出,尼日利亚学者阿穆塔

---

① 参见 G. G. Darah and Sunny Awhefeada. “Omafume Onoge: Africa’s Revolutionary Marxist.” Digital Library and Museum of Urhobo History and Culture. Urhobo Historical Society. April 14, 2025. <<https://urhobodigitallibrarymuseum.com/omafume-onoge-africas-revolutionary-marxist/>>.

(Chidi Amuta)于1989年出版的《非洲文学理论:对实践批评的启示》(*The The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al Criticism*)<sup>①</sup>是最后一本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著作。他说:

阿穆塔的书可以被视为1970年代奥诺格的论文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干预系列中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在198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对非洲文学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都面临危机,而在非洲,许多“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和政府的影响力大大减弱,这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持续有效性的质疑。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后殖民研究逐渐成为主流,成为非洲文学讨论的主要平台(尤其是在英美学术界)。(Fyfe 6)

如果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处在一个萧条时期,那么法伊夫编辑此专刊的目的何在?他是觉得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在非洲正在出现新的转机吗?他自己的陈述是,文学与全球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学界的热点,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影响下,著名学者如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和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重新复活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活力。这让一些学者注意到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文学上亦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而欠发达地区的文学不但不是这种不平衡的反抗者,反而是迎合者。他希望此专刊的文章“能提供一些重要的方法让人们思考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和文学美学的关系”(7)。对于更具体的意图,他解释说:

我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批评随着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和发展,并被众多个人实践者所采用。受这一多样传统的启发,本期特刊中的文章探讨了这些方法在当今的多种可能性和价值取向。尽管所有文章都致力于理解文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在与不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互动中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并从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历史中汲取了广泛的思想资源。(7-8)

在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做出一个总体评价和批评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1985年《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一书的历史意义。这部书和法伊夫后来编辑的新的论文集相比差别极大。总的来说,1985年选本里的文章表达了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因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学论文集,它的核心目的是确立一个非洲革命文学经典谱系。

<sup>①</sup> 参见Chidi Amuta. *The The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al Criticism*. London: Zed Books, 1989。

古格尔伯格说,他在选择文章时,就是找那些关于“亚历克斯·拉古玛(Alex La Guma)、恩古吉·乌斯曼·塞姆班、范德波斯特(van der Post)和奥克特·普比泰克(Okot p'Bitek)的批评”(Gugelberger vi)文章。而这些人当时被视为革命作家的典范。确定革命经典需要找到一个“反”革命的对象,这个作家就是索因卡。因而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声讨索因卡的文集。

杰弗里·亨特(Geoffrey Hunt)的文章“两种非洲美学:沃莱·索因卡与阿米尔卡·卡布拉尔”(Two African Aesthetics: Wole Soyinka vs. Amilcar Cabral)将索因卡的风格定义为“浪漫主义”,旨在分析索因卡所代表的非洲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说:

在像尼日利亚这样的新殖民地国家中,统治阶级被人们以各种不同的名字称呼,如买办资产阶级、伪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它并不拥有或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而是作为外国资产阶级和当地工人、农民以及佃农之间的一种商业和次级管理中介。这个阶级依赖于外国资产阶级,后者是它对抗当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盟友,但同时,它又以“民族独立”的概念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并且客观上逐渐发展出与外国资产阶级利益相冲突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成员在阶级属性上存在着一种深刻且结构性的矛盾。(Hunt 67)

而索因卡的作品“是这种新殖民地式阶级矛盾心理的最高文化表达之一”(同上)。和西方的浪漫派一样,索因卡逃避自己的人民,期望借助“上帝、自我、国家、个人、传统和自然”(66)给现实以意义。索因卡的反面则是革命家、烈士、马克思主义者卡布拉尔。亨特给予卡布拉尔高度评价:

正如革命领袖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矛盾只有通过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并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才能得以解决。对于卡布拉尔来说,如果脱离了如何释放被帝国主义所瘫痪或转移的巨大生产力的问题,那么关于文化的寻根或“回归本源”的问题就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机会主义的。(83)

另一篇批判索因卡的文章是杰伊夫(Biodun Jeyifo)的“悲剧、历史与意识形态:索因卡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和易卜拉欣·侯赛因的《齐恩杰凯迪莱》”(Tragedy, History and Ideology: Soyinka's *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and Ebrahim Hussein's *Kinjeketile*)。这篇文章试图定义非洲悲剧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作者指出,索因卡的悲剧概念介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

尔之间,与马克思提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念相距甚远:

索因卡选择这种特定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秩序来象征非洲文明,而不是选择其他更具平等主义色彩的非洲创世论和形而上学体系,这体现了他当前意识形态盔甲上的裂缝和凹痕。对于那些更具平等主义色彩的非洲创世论和形而上学体系的侵蚀,意识形态和政治进步者可以更有理由表示遗憾。一种理想化并掩盖非洲社会中冲突和矛盾的形而上学,一种合理化了有权有势的少数人(如埃莱辛)对被欺骗的多数人(妇女、随从、阿穆萨等)统治的形而上学,是发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阶级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延伸。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延伸是如何发生的。(Jeyifo 102)

以上对索因卡批判的角度、措辞和所使用的概念都让我们看到一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非洲的兴起。这种思想风暴的中心是建立一套关于阶级斗争的人民文艺的叙事。这里面密集出现的词语是“阶级”“宗教”“封建”“剥削”“斗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暴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工人阶级”“唯物主义”“人民”“革命”等。这些词语的引入给沉闷保守的非洲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政治斗争的能量,将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形式以及作家的思想、政治立场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的世界史中加以分析和评判。这是这场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给非洲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非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有不同。如《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中的文章所示,南非学者描述了国内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情况。作者担心的是,工人运动在文学中尚缺乏关注,呼吁南非的黑人革命者重视工人阶级文学,其思想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sup>①</sup>在东非,列宁主义的影响十分深远。格兰特·卡门朱(Grant Kamenju)是著名的列宁主义者。在他研究恩古吉的小说《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中,处处以列宁的语录来评价恩古吉的写作。比如,他认为恩古吉在描写内罗毕的铁路线时,没有写出其体现的殖民主义掠夺本质。他引述列宁语录道:“然而,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在帝国主义时期,道路、铁路和其他交通通信设施的基础设施必须被看清楚其本质:它们是深入且更紧密地获取殖民地世界的自然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手段,其目的是

---

① 参见 Michael Vaughan. "Literature and Populism in South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Ideology of Staffrider."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d. Georg M. Gugelberger.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85.195.

更激烈地剥削这些国家的资源和人民。”(Kamenju 133-134)而在尼日利亚,毛泽东和西马的影响并存。白人学者古格尔伯格极为推崇布莱希特,认为他的“间离戏剧”对非洲进步戏剧具有启示作用,它向作家展示了如何通过戏剧将人民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唤醒。古格尔伯格似乎对毛泽东的著作并不熟悉,连“文艺是为谁的”也是引用布莱希特的说法。而从美国归来的黑人学者奥纳格则相反,他熟读《讲话》<sup>①</sup>,赞赏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是为谁的?”“文学的艺术性和政治性同样重要”等思想。这部文集包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法农主义等学说,显示出非洲已是多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试验场。

如果稍事总结一下这个时期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主要贡献,我们认为有几点至关重要。第一,非洲文论家第一次尝试对非洲文学发展的规律做出总结。在此之前和之后,非洲文学史基本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领域,出于各种原因,非洲文学研究者很难形成一个历史的概念。但是,奥纳格的“现代非洲文学的意识危机”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他贡献了一个线性进步历史观。这篇文章无疑是文集里最有才华的一篇。它不是讨论具体的革命作家和文本,也不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古格尔伯格和亨特那样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西方文学为参照,为非洲文学提供一套判断标准。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1930年的黑人性运动到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看成一个有着历史逻辑的整体?他要建立一套非洲文学内在的整体文学观念,而整体性文学观念是文学历史观的基础。奥纳格使用黑格尔的意识描述的方法,一点点告诉我们非洲文学意识是如何通过自我分裂和自我克服一步步向前发展的、为什么从黑人性的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非洲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所以在非洲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作家的意识可以超前发展到更高阶段。奥纳格的总体文学研究法和历史主义是对非洲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sup>②</sup>

第二,非洲文论家不再将非洲文学看成西方文学的一个延伸,而是引入了第三世界这个新的政治空间,将非洲文学看成反帝反殖的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强调了作家的政治性、批判性以及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这种文学观念在之前西化的现代非洲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那里是匮乏的。

第三,萨特在1947年曾总结非洲文学的基本特点,称之为“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Sartre 29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非洲文学性质做出的深刻断言。其含义是,非洲文学不是阶级文学,因为非洲人民首先是非洲人,

① 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 参见Omafume F. Onoge. "Th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A Survey."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d. Georg M. Gugelberger.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85. 21-49.

之后才能是无产阶级。这个论断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后创建的民族主义文学中尽显其正确性。但是，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改变了萨特预言的非洲文学发展的轨迹，将阶级看成非洲人新的政治认同。

1970年代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激进性奠基于“阶级认同”这个新的概念上。没有阶级这个概念，就不会有对作家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也不会有对指定的“落后”作家的批判，更不会有对未来社会将发展到社会主义及文学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断。这一切都建立在阶级分析法上，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一套激进的文化政治在35年之后法伊夫编辑的文章中荡然无存。两个不同时代的文集的作者隔着不是一代人而是两代人，而连接他们的那一代人似乎在历史上已经消失。当然，这样的说法略显笼统，更多的历史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只是在研究这两个文集的基础上，对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变化做出一个暂时概括。一方面，两者的相同之处显而易见，这可看作是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的连续性的体现，其最为主要的特征是以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去研究文学和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基本关系，这个时代环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全球资本主义。新一代学者将环境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扩大了早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围，并且将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列为新文集的另一个关注点。除了几个新的研究问题之外，作为分析非洲社会问题的核心概念——阶级和种族——之间的张力依然是强大的，是非洲知识分子争论不休的话题。另一方面，两者也体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唯物主义”虽然被保留下来，但是辩证法却被抛弃。没有辩证法，就没有分析社会矛盾的方法，也没有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集失去了改变世界的热情，它变成了学院生产的批判理论，依然以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但不再建构改变现实的历史“主体”。因此，被批判的资本主义看起来像是一个无历史之庞然大物，这个世界完全被其所统治。西方左翼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改造为批判理论，终于在非洲文学研究领域被制度化。本文开头提出的区分非洲文学中的“左翼”写作和马克思主义写作，也许还应该做进一步引申，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存在这种“左翼”化的倾向，即变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德·考克提出的“消失的剧情”的论述。它迫使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在过去30多年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什么剧情被丢失了——失去的一代人、被忽视的辩证法、历史和主体问题等，更重要的是与1960年代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相比，丢失了什么剧情。答案似乎也是显然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冲动被科学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替代，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和非洲社会实践失去了最有机的关联。于是，

这个“消失的剧情”可以表述为内在于非洲历史主体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文学表达。历史上真有过这个剧情吗？它是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消失的？重新发现它有什么意义？这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问题构成本文的根本问题意识，那就不以科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文学理论作为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实践的判断标准，相反，我们更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如何帮助非洲形成现代自我主体意识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事实上，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非洲的民族意识和泛非主义精神已经形成，比如极有感召力的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领导的“回到非洲”运动(Back-to-Africa Movement)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但是，加维的政治主张必然失败。而当泛非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提出建国方案时，非洲独立解放运动才真正开始。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黑人的民族解放、民族自觉构成极为复杂的张力。取消了这个张力，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就只能靠外来动力推动；保持这个张力，非洲知识分子就以自己的历史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也是如此。1970到1980年代，非洲形成了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谱系，但这个谱系本身很不完善，因为符合标准的非洲作家并不多。然而根本的问题也许不在这里，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个标准本身的局限性：它是否排除了非洲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余文将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 三、非洲主体意识统摄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我们将提出的一个根本看法是，当马克思主义不以抽象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作为一种感性的美学被非洲作家接受时，它就能极大程度地激活非洲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句话在中国的语境下也许不易理解，但是了解非洲历史的人都知道，殖民主义摧毁了非洲的文化传统、破坏了非洲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且为非洲生产了一套关于非洲的知识，非洲长久地成为西方的一个镜像。在此文化殖民暴力下，非洲人不仅被剥夺了言说自我的能力，甚至无法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一种积极的审美体验——黑人肤色是丑陋的、习俗是低俗的、黑人男性的力量对白人女性是邪恶的威胁等等，什么生活有价值且值得文学家去描述呢？非洲人首先想到的答案是非洲的过去和历史，于是便有了重新发现传统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但这种对传统的再发现并未摆脱镜像逻辑，因为它是照着西方的镜子来寻找自我——西方是理性的，非洲是感性的；西方思想是分析的，非洲思想则是综合的，等等。1970年代之后，随着非洲的革命运动将矛头指向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无产阶级”“大地受难者”“工人阶级”“农民”取代了传统，成为文

学最有价值的描写对象。如果说,人类学深刻地影响了非洲民族主义文学,那么社会学则深刻地影响了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1990年之后,资本的全球化运动令非洲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它已经不可能再用“民族文学”和“阶级文学”作为主要的分析概念来加以描述,一批新的术语开始出现——多重身份认同、跨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等,这个时期文学的主人公也从“民族人”“阶级人”过渡到公民、个人、难民和流亡者等形象。非洲文学虽然历经数次变化,价值系统不断调整,但有一个东西一直没有变化,这种稳定之物便是此节要讨论的内容,它是一种感性美学,我们先将之称为“发现日常”。

非洲文学不仅“发现传统”、“发现阶级”,更重要的是“发现日常”。“日常”(the ordinary)指平常日子中的生活常态,它包含着“阶级”和“传统”要素,但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些要素不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与其他生活要素混合于一处,共同构造了非洲人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基础。这个“日常”在民族主义文学和阶级斗争文学里面常常处于隐形状态,仿佛对非洲人来说,重要的只是阶级和民族两种属性,或者说只有阶级生活和民族生活才有价值。与这两个概念相比,“日常”放弃了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价值范畴,重新对世俗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此刻”给予关注,并将其确立为最有价值的文学表现的对象。文学的“发现日常”意味着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一种作家能摆脱教条主义、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并将之创造性地转化为审美经验的能力。非洲最优秀的作家都具备这种从现实生活提取艺术素材的能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现日常”并非一种文学理论,而只是一种广泛的文学实践。直到1985年左右,南非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恩贾布洛·恩德贝勒(Njabulo S. Ndebele)才将之理论化,并且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恩德贝勒“发现日常”的理论在非洲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出现在一个时间交叉点上:一方面,南非人民正在对种族隔离制度做着最后的英勇斗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汹涌不断;另一方面,其他非洲国家建设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反思。因此,恩德贝勒在南非革命进行得最为轰轰烈烈的时刻,反而能超越彼时的主要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提出“发现日常”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对非洲文学史总结和反思的结果,更是对南非当下文学与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sup>①</sup>

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取得胜利是在1994年,而在1985年前后,恩德贝勒已经开始思考革命之后的问题,即谁才是新南非合格的建设者?他/她需要什么能力和德性?文学在未来国家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发现日常”这个理论强调,黑人如果能成为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体,他的创造性、分析力、

---

<sup>①</sup> 参见 Ndebele 44。

想象力便是最重要的品质。黑人必须摆脱生活在表层的状态,建立起反思的、智性的生活;如果没有丰富的内在性生活,而是处处服从于习俗和政治运动的需要,那么黑人不可能想象未来合理生活的样态。从表面上看,恩德贝勒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事实上,它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深刻影响,更是马克思主义非洲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对恩德贝勒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本雅明、萨特、法农、马尔库塞、恩斯特·费舍尔(Ernst Fischer)等人,他从这些思想家身上汲取了有益的养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

恩德贝勒的思想并不复杂,但他比任何文艺理论家都更清晰地指出南非文学(也是非洲文学)的一个问题,即它有过分苦难化抒写的倾向。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英国所创“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模式的巅峰,以残暴和非人性著称。作家往往只需实录黑人矿工的生活、黑人城镇的破败与无序、街头黑帮、农村的凋敝,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艺术加工就足以产生戏剧化的剧情,这种长期形成的写实风格让南非黑人文学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剖析,只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恩德贝勒在评价这种反抗文学时说道:“因果关系在于建立简单的联系,从而产生最令人震惊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尝试去深入探究动机的复杂性或社会过程。人物和情景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那些坏人总是会在一夜间放弃他们的邪恶行径。”(Ndebele 39)反抗文学因为依赖不可调和的冲突模式,变得日益僵化和教条:“最近,我曾指出,所谓的抗议文学可能已经在南非走到了尽头”(58),“问题的根源在于南非压迫的性质以及其持久性几乎在全国范围内诱导出一种独特的思考社会政治现实的方式,一种将现实纯粹视为绝对对立两极的认知论”(同上)。“换句话说,抗议的修辞开始取代了通过批判性关注压迫的具体社会和政治细节来应对压迫力量所必需的承诺。这种取代可能会对被迫者发展出一种富有创造力的分析性方法以应对困境的能力产生毁灭性的影响。”(61)恩德贝勒创造了“奇观化”(representaton of spectacle)这一术语来形容这种从外部描写社会矛盾的文学:“南非的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观: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庞大的战争机器;随机的大规模通行证突袭;大规模枪击和杀戮;大规模经济剥削,其中矿业是最极端的象征……白人的奢靡:仆人、全面的特权、游泳池和高消费水平。”(37)和奇观化文学对立的是“日常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日常’被定义为‘奇观’的对立面。日常是清醒的理性;它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必要细节上的过程。关注普通事物及其方法将显著增强意识。”(50)

恩德贝勒用“发现日常”的概念批评整个南非黑人文学的既有传统,继而在理论上提出黑人文学缺乏一种“内在性”的品质。长期以来,南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将“内在性”“主观性”视为资产阶级文艺的特性并加以否定。恩德贝勒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家迈克尔·沃恩(Michael

Vaughan)的错误,提出“自我意识”“内在性”“新的感性经验”和“主观体验”这些“发现日常”理论的核心要素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文艺特征,而是革命文艺的特征。恩德贝勒引用马尔库塞思想为其背书:

即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坚持内在真实和正当性也并非真正的资产阶级价值观。通过肯定主观性的内在性,个体摆脱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隐,进入了另一种存在维度。事实上,这种对现实的逃避催生了一种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并且确实)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用以否定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具体而言,它将个体实现的领域从“绩效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资源的领域:激情、想象力和良知。此外,退隐和撤退并非最终的立场。主观性努力突破其内在性,进入物质和知识文化领域。而在当今的极权主义时期,这种主观性已成为一种政治价值,作为对抗侵略性和剥削性社会化的反作用力。(Ndebele 28-29)

可以说,在马尔库塞的影响下,恩德贝勒突破了对抵抗文学的陈旧理解,即重视集体声音,忽视作家个性;强调宏大叙事,贬低个体体验;突出文学中客观世界的矛盾和对抗性特征,忽视作者主观世界里的情感、想象力和创造力。“激进变革的必要性”,他引用马尔库塞道:“必须根植于个体自身的主观性,根植于他们的智力和激情、他们的动机和目标。”(30)

简言之,恩德贝勒在革命文学兴盛的时代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革命文学和恩德贝勒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区别是:前者属于被压迫者的反抗文学,革命作家们无法摆脱“被压迫者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文学革命需要扬弃的,因为在新南非,被压迫者必须有主人翁的意识,国家的形态、现代化的道路和社会生产关系都将由新的历史主体来界定,而昔日白人统治者则落到从属地位。文学革命说到底是意识的革命,是从“奴隶意识”到“主人意识”的转变:

南非作家若想顺利进入后抗议时代,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彻底摆脱白人压迫者在被压迫者想象中作为活跃、主导角色的存在。这种策略性缺席能使作家巩固被压迫者对自身共同体的认同感,使其在心理上更加自给自足。然而,这种态度只有在作家真正相信被压迫者——首先作为未来创造者——的前提下才能奏效。这暗示了对辩证对立两极的彻底重新排列。压迫者曾是辩证法中的正题,现在被压迫者则自信地定义未来,而压迫者必须做出回应。(71)

在新的文学中,反抗的模式将被“开放性对话结构”所替代,对殖民统治的愤怒、长期被奴役所形成的自卑和意气消沉将被新颖的感性所替代,文学的任务则是描述一个充满活力的、自信自足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体生活。

我们当然需要问:恩德贝勒“发现日常”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吗?从某个角度说,恩德贝勒的理论有种黑格尔主义倾向,他强调黑格尔式主人意识,这个主人意识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意识”,他设想的新文学也不是一种阶级文学。显然,恩德贝勒忽视了南非在未来将出现激化的阶级矛盾,这是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个失误。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恩德贝勒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主人意识”获得的目的是“想象”一个客观存在的、充满积极性的共同体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唯物主义原则。恩德贝勒的理论显示了他的一个倾向,即将被压迫者看成一个阶级,人民的解放因此等同于阶级的解放。这个思路与1960年代的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十分相似,这或许是马克思主义非洲化最基本的模式,在那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一体两面。这个统一体就是非洲主体意识。在恩德贝勒的思想里,我们能看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本文看来是马克思主义非洲化的历史缩影。对于非洲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来说,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把非洲人重新看成人,看成充满人性、有着人的尊严的存在,看成自己历史的创造者。这是现代非洲的“政治无意识”。

## 结 语

本文对非洲马克思主义作家、作品、批评家和相关文学运动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挂一漏万,遗漏了太多细节及有价值的问题,比如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对南非自由主义剧作家富加德(Athol Fugard)的深刻影响、南非女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写作与卢卡奇“整体性”理论的关系、莫桑比克及安哥拉在1970年代反殖斗争中出现的大量革命小说和诗歌、民间期刊中的抗争作品<sup>①</sup>和口语抵抗诗歌等。我们对这些文学运动和实践的后续研究会逐渐形成关于非洲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的较为完整的叙事。本文的目的是为这个刚出现的知识对象的性质做初步的理论探讨。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非洲化”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今天看,教条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给非洲文学和非洲文学批评都造成了伤害。机械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得恩古吉的小说写作和批评都变得僵化而教条。而

① 参见拙文:“黑人的觉醒与文艺制度的设计——初创时期的《扒车人》(1978—1981)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2024): 5-31。

今天,不加思索地批判一切国际资本使得尼日利亚左翼作家费米·奥索菲桑(Femi Osofisan)写出了《全都为了凯瑟琳》(*All for Catherine*)<sup>①</sup>,对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造成了伤害。<sup>②</sup>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本文主张对非洲文学“天然的左翼”性质率先做出分析和批判,并澄清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差异。而要使得这种区分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定义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依据什么去定义?通常我们可能会想到“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标志性概念。然而,这种想法依然犯了概念先行的错误:预设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概念定义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但如果我们从“非洲化”的角度来考虑,思路将会不一样。我们要着重思考的是:非洲现代思想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什么关系?非洲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文学家)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解决非洲问题的方法?哪些方法是长久有效的?哪些合作是短暂的?我们在这种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的关系中——而非先验定义中——看到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文艺的特点。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对非洲主体意识的生成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是非洲形成历史主体理论自我表述的一个内在维度。在此观念下,本文批评了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两个时期: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时期,另一个是今日的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未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充分非洲化。本文肯定了充满争议的非洲社会主义时期,灵活多姿的非洲马克思主义遗产就是从那里留下来的,南非思想家恩德贝勒是这个遗产最优秀的继承人,他将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恩德贝勒的理论对今天非洲思想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武器。他的自由主义概念之含义要比“自由市场”宽广得多,其真正的内涵是:非洲的知识主要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体制的产物,它是为统治非洲服务的。非洲的解放如果不从观念的解放开始,非洲人就不会成为自己文化和体制的创造者。如果改变世界的历史主体没有形成,客观世界如何改变?这种分析世界、改变世界的主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洲化的一个伟大成果,它和马克思批判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天然非洲左翼文学自我更新的方向。本文赞同朱振武、李丹的判断:“因而非洲作家[……]在去殖民的文化重建中打破西方的单一想象,并在主体自我重构中不断深化非洲性的文化内涵。”(朱振武、李丹165)

① Femi Osofisan. *All for Catherine*.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参见朱振武:“中非文学的交流误区与发展愿景——关于《雷雨》在尼日利亚的归化改编”,《文史哲》6(2022): 138-149+165。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El Nabolsy, Zeyad. "Questions from the Dar es Salaam Debates."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Africa: An Untold Story*. Eds. Pascal Bianchini, Ndongo Samba Sylla and Leo Zeilig. Dakar: Pluto Press, 2024. 244-261.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 Folson, B. D. G. "Afro-Marxism: A Preliminary View." *The African Review: A Journal of African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6. 4 (1976): 92-117.
- Fyfe, Alexander.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Today." *African Identities* 18.1-2 (2020): 1-17.
- Gugelberger, Georg M. "Introduction."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d. Georg M. Gugelberger.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85. v-ix.
- Hunt, Geoffrey. "Two African Aesthetics: Wole Soyinka vs. Amílcar Cabral."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d. Georg M. Gugelberger.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85. 64-93.
- Jeyifo, Biodun. "Tragedy, History and Ideology: Soyinka's *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and Ebrahim Hussein's *Kinjeketile*."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d. Georg M. Gugelberger.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85. 94-109.
- Kamenju, Grant. "Petals of Blood as a Mirror of the African Revolution."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d. Georg M. Gugelberger.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85. 130-135.
- Lazarus, Neil. "Afterword." *African Identities* 18.1-2 (2020): 182-192.
- Ndebele, Njabulo S. *The Rediscovery of the Ordinary: Essays on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ohannesburg: COSAW, 1991.
- Nyerere, J. K. U. *Ujamaa Essays on Soci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arry, Benita.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Ed. Neil Lazar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6-80.
- Rathgeber, Eva M. "The Book Industry in Africa, 1973-1983: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Publishing in the Third World: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Eds. Philip G. Altbach, Amadio A. Arboleda and S. Gopinathan. London: Heinemann, 1985. 57-75.
- Sartre, Jean Paul. "Black Orpheus." *What Is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Editions Gallimar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89-330.
- Saul, J. S. "The Context: Colonialism and Revolution." *A Difficult Roa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Mozambique*. Ed. J. S. Sau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5. 35-74.
- Wainaina, Binyavanga. *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 London: Hamish Hamilton, 2022.
- 朱振武、李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中国社会科学》8（2022）：163-184+208。
- [Zhu, Zhenwu and Li Dan. "African Literatures and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fei zhou wen xue yu wen ming duo yang x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8 (2022): 163-184+208.]